

■ 热点评议

美国人喜欢狗拿耗子

张恩照出事后,曾任香港中信嘉华银行总裁的蔡重直有一个说法:当代理人(比如张恩照)认为委托人(政府)对他不公平,这种不公平还没有合法的诉求渠道,于是忠诚问题就会产生。最简单的做法是,代理人通过他的管理权力重新分配其管理的机构的所得,以纠正委托人的不公平。

其实在旁人看来,也许委托人已经足够公平甚至恩重如山了——没有市场业绩的考核,没有公众口碑的测试,你何德何能,委托人就让你放到高位来掌管公众财产?甚至当你业绩平平,甚或犯了错误,委托人还礼送你易位做官,这不是恩重如山吗?为何不忠?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事干得不错,也有市场业绩和公众口碑佳证,但由于与委托人性情不和,甚至因为要安排别的干部,于是请干事的代理人走路。深交所前副总经理王建上任后就担心这种情况,说:别干正事,一张纸三行字就把人调走了。现今,人虽然经常被调来调去,但此后活儿不多干钱不少拿——你也犯不着不忠呀。

对张恩照此次去职,有多种说法,如张卷入周正毅骗贷案;在建行信息化和数据搜集过程中张接受了一家国外企业的贿赂;张在建行选择上市承销商时受贿;建行处理不良资产失败;张受家属涉嫌经济犯罪牵累等。至今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法是,张恩照是吃了洋荤累。美国公司 FIS 向建行推销银行管理软件,另一家公司 GD 从中牵线搭桥,二位商定,事成后 FIS 给 GD 好处费。后来果然成了, FID 却没给 GD 分成。GD 急了,告下 FID,告下张恩照受贿。

你个老外凭什么管在别国土地上违法犯罪的事?这不是狗拿耗子吗?原来,美国政府发现许多美国公司为获取优惠待遇争相向外国官员行贿,这破坏了美国企业的商业信誉。为倡导良性竞争的市场规则,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反海外腐败法》:你就是出国去犯罪也不成。2004年4月,美国人就用此法办了4名公职(中国)公司的中国雇员,他们向中国官员行贿。

有好事的中国记者曾问检察机关,为什么不查中国的受贿者?答曰:美国人没报上材料也没有中国人举报,怎么查?从这一点上看,中庸的中国对代理人实在是恩重如山。也许正因为此,中国有关部门不会不知道像张恩照这样的高官受外国公司款待,去美国加州卵石滩打世界最昂贵最豪华的高尔夫,但却不去追究。这回卷入官司了,不得不令张恩照因个人原因辞职——总体上还是恩重如山的。

但张恩照为什么还是不知?

(文/王安 摘自《青年参考》)

圆明园加膜 长城贴瓷砖?

“给天安门上开关,给黄河装上栏杆,给飞机配上倒挡,给长城贴上瓷砖”。这想象力颇为丰富的“四大工程”是一则广为流传的手机短信,对此大多数人也不过就是一笑了之。这四项工程无疑难度很大,相比之下,北京圆明园最近在湖底铺设防渗膜的工程倒是容易得多。

“这是一个‘外耻内惠’的典型”,对圆明园最近在湖底铺设防渗膜的工程,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专家做出了如此激烈的评价。的确,众多专家的分析看,此事确实“愚”到了家,文化与科学都将为之蒙尘。从当前的舆论形势看,如果评选2005年最愚蠢的工程,圆明园此次耗资1.5亿元的“大手笔”,估计肯定能够入选。

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北京有很多的科研机构,有很多全国一流的高等院校,有无数的专家,还有很多的国家权力机关,而圆明园又是如此特殊的一处场所,耗资如此巨大,可能性后果如此严重,用常识就可以判断出此愚蠢程度的工程,怎么就能这么顺利地立项、论证、开工,并且持续数月而不受到制止?

圆明园不是北京的圆明园,圆明园更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圆明园,圆明园属于历史,属于全中国。谁给了他们随意“折腾”圆明园的权利?不由想起去年10月份,在圆明园罹难144周年纪念活动时,有人提出的“圆明园有必要动一动”的建议。建议一经提出,引起舆论哗然,遭到普遍批评。看来,虽然当时人们的态度是那样激烈,但圆明园的有关管理部门还是决意要“动一动”,竟对群众的声音如此置若罔闻,如此地一意孤行!

有网友调侃:强烈建议长城也贴上瓷砖,美观又气派!也有人则建议,把全北京用塑料大棚罩起来,防范沙尘暴,还可节约大量的防护林种植、维护经费”。我想,有关部门做出此荒唐之举,到底是因为“无知者无畏”,还是因为利益驱使?难道是人们所猜测的那样,就是某些人挖空心思,找出个花钱的项目? 这确是一件比景点涨价还要严重得多的公共事件!

(和讯网)

一家房地产公司、两个律师、一个银行内部人,利用北京一座名为“森豪公寓”的烂尾楼,共同导演了一出堪称经典的骗贷案……

惊天骗案 蛰伏四载

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在惊曝哈尔滨河松街支行“高山事件”之后,中行再次被北京森豪公寓虚假按揭6.45亿骗贷案推至风口浪尖。

4月2日,星期六。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在周末休息时间,主动向媒体披露一桩金额高达6.45亿元的骗贷案。这次受害的主角是北京分行,故事似乎颇为精彩:一家房地产公司、两个律师、一个银行内部人,利用北京一座名为“森豪公寓”的烂尾楼,共同导演了一出堪称经典的骗贷案。面对接二连三的银行腐败案件,王兆文不得不坦然承认,“在我们银行内部确实内控机制薄弱,风险管理有缺陷。”

“陈年旧案”?

中行正在进行一场危机公关。在此前所有媒体的报道中,均认为是中行主动披露了该案,但记者辗转了解,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不是媒体的提前曝光,森豪公寓骗贷案可能还要沉寂相当长一段时间。

一位知情者称,由于近期中国银行业腐败案件层出不穷,而且中行正处在上市的关键时刻,再加上森豪公寓案件尚在侦查阶段,中行原本打算在案件调查结束后再公布相关案情,但上周南方一家媒体的报道打乱了中行的计划。“这本是一桩陈年旧案,中行其实在两年前就在内部稽核中发现了问题”。上述知情人士介绍说,华运达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邹庆以

涉嫌贷款诈骗罪于今年3月被捕。

在2000年12月至2002年6月,邹庆以开发“森豪公寓”为名,与中行北京市分行签订了楼宇按揭贷款合作协议,后虚构销售“森豪公寓”事实,借用他人身份证,提供虚假收入证明及首付款证明,从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骗取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共计6.4亿元。王兆文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也佐证了这一说法。

经审理查明,从2000年12月至2002年6月,华运达公司采取假按揭的方式,从中行北京分行申请按揭贷款199笔,涉及公寓273套,形成风险敞口64494万元。

来龙去脉

中行在内部稽核中只是发现了可能存在风险,但却并没有理清案件的来龙去脉。

森豪公寓的开发商是北京华运达房地产开发公司,邹庆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徐维联曾任中行北京市分行零售业务处副处长;孔卫东和战军是两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正是这数人,共同导演了这起利用个人按揭贷款的骗贷大案。

据有关人士介绍,森豪公寓最早于1996年12月开工,在主体结构封顶后,正值亚洲出现金融危机,决定暂时停工。2000年年初,华运达决定重新启动这个项目,但由于华运达的资金链十分紧张,最终决定铤而走险,利用虚假按揭向银行骗贷。

记者进一步调查显示,北京华运达不仅大肆从中行骗取贷款,而且还欠下了47家债权人(包括施工单位和建材商等)共计1700万元,后因无力支付被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在经过了近一年的审判等待后,2004年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前往华运达执行,华运达方面称,项目尚未完工,房产无法变现。随后,法院本着施工款优先的原则,为债权者的债权,法院查封了森豪公寓项目。

以下的细节值得注意。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04年1月20日向二中院致函,称森豪公寓项目中的房屋已在法院查封前办理了预售登记。根据最高法院的精神,已经预售登记的房屋,法院无法处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也向二中院提出不能拍卖楼盘。因为曾经有180多户小业主向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办了房屋按揭贷款。但是这180户小业主在房屋交付到期后没有一家提出交房,这令法官感到十分蹊跷。“正是因为发生了执行异议,这一案件随后陷入僵持阶段,直至事发。”北京华运达的一位债权人愤愤不平地表示。

“内鬼”徐维联

在这起骗贷大案中,时任中行北京市分行零售业务处副处长的徐维联被认为是起到了

关键作用,他也因为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被捕,理由是“违反法律、行政规定,为森豪公寓项目发放贷款6.4亿元”。2002年10月,徐维联被撤销了副处长之职,并被中行北京市分行予以开除。据接近徐维联的人士透露,被开除之后,两年多时间内,徐维联平安无事。相关部门一直未对徐维联采取措施,直到今年3月北京市检方的介入。

徐维联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中行北京市分行的一名副处长,负责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在北京房地产圈子里,徐维联颇有名气,因为他手中握有审批个人按揭贷款的权力。从2001年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中行北京市分行零售业务处处长空缺。

另据了解内情的人士称,徐维联曾得到华运达公司的好处费800多万元。他这种行为是受贿,还是合伙诈骗,检察机关尚未有定论。

在这起大案中,有两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被捕,是哪些有些出人意料。孔卫东是北京嘉惠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战军是北京华义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在律师界,两人都小有名气。二人被捕理由相同,均是在为森豪公寓办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出具证明文件严重失实。前者造成中行北京市分行被骗6亿元;后者为3000多万元。

中行整肃

熟悉房地产业的人都心知肚明,假按揭

斯梅德利太太有失厚道

2004年年底,《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一位名叫佩姬·斯梅德利的美国妇女决定用一种令多数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庆祝圣诞节——不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作礼物。最后,经过千辛万苦,她终于为孩子买到了美国制造的长统靴和咖啡机。她的体会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商品,都有80%是中国制造的”。

文章交代了“事件”的背景,斯梅德利太太的这段购物经历不仅仅是为孩子准备圣诞礼物,还是一种工作体验,她的职业是读者群为制造业高层的杂志的主编。她认为,是中国让美国的制造业枯萎了。

近来,“中国制造威胁论”突然甚嚣尘上,其由头可能是2005年起纺织品配额的取消。这篇有趣的报道,只是圣诞节前后,国外媒体关于中国制造的众多报道中的一篇。在这轮报道中,当数美国《商业周刊》的《中国价格》和法新社的《全球庆祝“中国制造”的圣诞节》等数篇最吸引眼球,前者历数了中国价格对美国制造业的杀伤,后者选取了特写的场景加以论述。而《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则算得上是见微知著。

欣赏了几篇大作后,最大的疑惑是,这些知名的财经媒体为何不约而同地失去了大气和厚道,甚至忽略了常识:在商业生物链里,一流企业制定标准,二流企业制定技术,三流企业才负责制造。在当今的全球一体经济中,中国荣幸地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有人认为不过是世界车间),但即使工厂设在中国,厂长也是由美国担任,总工则是欧洲和日本。

就在美国人惊呼中国制造的威胁时,中国人更在为标准和技术的缺失而焦虑。且不说微软和英特尔在中国执掌着生杀大权,也不说中国DVD制造商每年要向海外上缴巨额专利费,连中国的联赛都已经被NBA标准了,英语成为个人升学就业提升晋职的标尺。在全球分工中,中国人分到的只剩下了制造。作为全球一分子,笔者也提醒中国的制造商,要顾及到他们催枯拉朽式的出口攻势对生态圈的破坏;要懂得给外国同行“留有余地”,以免“烧鞋悲剧”重演。但同样,依照对生态圈理论的理解,笔者也要提醒斯梅德利太太们,不必对中国制造太大惊小怪。

据说,斯梅德利太太的儿子从来没买过美国制造的东西,这也印证了朋友说过的一句“黄色”笑话:“美国人只用两个器官,上面的制造灵感,下面的制造快感,剩下的让别人去做吧!”中国人制造的何尝不是美国人剩下的东西呢。

把斯梅德利太太的举动看作是为一种行为艺术似乎更妥当,怪诞的举动冠以艺术的名号,就会被更多的人理解。还要劝一劝斯梅德利太太,本着厚道的心态面对中国人无奈的选择和辛苦劳动,并心安理得地享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吧,否则,有朝一日,一元人民币兑8.26美元,汉语成为美国人安身立命的标尺,张怡宁、王浩成为美国青少年的偶像,斯梅德利太太不知还要做出何种惊世骇俗的举动。



不给猛兽扔活物喂养的“承诺”,仅仅是一个文明的开始。

动物福利与人的福利不矛盾

蔡海鹰,45岁。他这个年纪,经历过中国商品短缺时代,提到动物福利,他用“很难想象”4个字来表达。小时候,蔡海鹰住在公安局的机关大院里。困难时期,机关杀猪的日子像过节,每次都追得猪“嗷嗷”叫,直到追累了,猪才流着汗束手就擒。蔡海鹰说:“如果有动物福利,人们追累了猪,只好对猪说,您今儿累了,歇着吧,明天再追您。大家什么时候吃得上市肉啊!”

“提倡动物福利与提倡人的福利并不矛盾,这早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宗教中就有所贯彻。”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说,佛学上认为,动物通灵性,必须得到关爱,中国的寺庙门前都写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说的就是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要尊重,有善心。

不过从道德的角度,王德峰教授又反对把人的伦理标准贯彻到自然中去。他说,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上,人永远是自然界的中心。我们不提倡人类用文明征服自然,但人从来不能放弃对自然的干预。在对待动物问题上,人只要有足够的爱心,尊重生命就可以了。王德峰教授还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关爱动物,关爱生命的程度,但我们要试着去做。这些都是人的福利,动物和人的和谐相处。动物福利和谐社会的一部分。

(文/黄泓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别把名人的建议太当回事



那些商业巨子提建议只是幌子,真正的用意在于借此向公众展现他们希望呈现给大众的一面,因为他们挑的是最能够承担自己的一条建议。1981年的时候,债券及股票交易员是人人向往的职业。我当时的男朋友刚刚加入罗罗马兄弟这家大公司。某天黎明,新员工会聚一堂,听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古德菲瑞德的讲话。讲话结束时,一个跃跃欲试、一副媚态的年轻人举手问道:“古德菲瑞德先生,您能给我们提点建议吗?”

古德菲瑞德回答说:“当然可以。”然后,他把手中粗大的雪茄移到嘴边,抽了当天的第一口烟后继续说道:“早上来上班时,你得做好咬下熊屁股的准备。”我很喜欢这条建议。它很有趣,也很有个性,还很有用。

我是在上周看《财富》杂志的时候,想起了古德菲瑞德的这条建议。该杂志访问了28位商界巨擘,问他们得到的最好建议是什么。从他们的回答来看,非常遗憾,1981年以后,提建议这个行当不怎么景气。看来,古德菲瑞德这条“做好咬下熊屁股的准备”的建议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杂志上刊登的这28条至理名言不是误导之词,就是陈词滥调,或者是一些不言自明的废话。

让我们先来看看那些误导之词。通用电气的前总裁杰克·韦尔奇声称,他得到过的最佳建议就是:“做你自己。”这也许是我听到过的最蠢的建议。除了做他自己以外,他还能做谁?如果这条建议是指要表现得自然一些,那么这条建议就称不上一条好建议。在商界,表现得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否则你等于在告诉你的老板,你认为他是个白痴。

下一条糟糕的建议来自于康卡斯特首席执行官宣布莱恩·罗伯茨的父亲:“把荣誉让给别人。”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这么做,你肯定一事无成。若想升职,讨功劳是至关重要的。诀窍在于,要不声不响地把主要功劳据为己有。

多伊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唐尼·多伊奇的建议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就能赚到钱。”这是最危险的一条建议。我的弟弟喜欢吹奏双簧管,弟媳喜欢写诗。他们俩最终发现,都没赚到什么钱。如果他们改行,做

点不是那么喜欢的事,如金融或股票或证券经纪业务,赚的钱恐怕要多得多了。

接受采访的商界巨星给出的建议大都非常可笑。以下这条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萊顿·克里斯坦森曾得到的最佳建议:“你能从任何人身上学到东西。”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每年交几万美金的学费去哈佛商学院上课不是浪费钱吗?从这些建议中,我们可以发现采访的真正目的——提建议只是幌子,真正的用意在于借此向公众展现这些人希望呈现给大众的那面,因为他们挑的是最能够承担自己的一条建议。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谈,他们生活中最为贤明的导师是他们的父母,而且都有一则小故事。梅格·惠特曼说,当她10岁的时候,她对某个人很刻薄,他的父亲就教导她说:“要善待他人。”这句话对幼小的梅格产生了深远影响。我肯定,我在10岁的时候,都没怎么善待他人。而且我敢说,如果我父亲发现这一点,也会责备我。

接受《财富》杂志采访的人中,有两位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他们给出的建议没那么“有用”。这两位分别是沃伦·巴菲特和彼得·德鲁克。巴菲特说,他父亲给他的有些建议是不对的,这话听起来不多见。德鲁克最喜欢的建议听起来有点粗鲁,但能令人振奋:“要么把事情做好,否则就给我滚蛋。”但实际上这条建议却没什么用。光是说说要把事情做好固然容易,但关键是怎么才能把事情做好呢?

现在,让我来说说我所得到过的最佳建议吧。22岁前,我曾写信给多家报社找工作。有一次,我误听了一位编辑的名字,把伊凡·法伦写成了伊凡·萨伦。后来,我收到了这名编辑的一封信简短回信,告诉我这家报社暂时不招人,还说,以后我应该学学怎么正确描写他人的名字。这条建议绝妙之极。唉,但就连这条小小的建议也和其他所有建议一样,有个缺陷:能分辨出这是条好建议是一回事,但把它付诸行动却是另一码事。

(文/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摘自《国际金融报》)

稿费事宜请作者联系
Tel:010-63077367
Email:wlb@zsb.com.cn

经济生活

动物的“福利”

动物也有福利?这在一些西方国家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比如,作为世界第一大养殖食用动物——猪,西方很多国家也为其规定了详细的福利待遇:小猪从出生开始至少有吃13天母乳的权利;拥有铺了稻草的猪窝的权利;拥有供其拱食的泥土的权利。猪在运输途中,运输车必须保持清洁,要按时喂食和供水,运输时间超过8小时就要休息24小时;在猪被宰杀之前,还规定了必须对其进行完全清洗;必须隔离屠宰,不被其他猪看到;杀猪要快,必须使用电击法;在猪完全昏迷后才能放血和解剖等等。

英国的新条例更加有意思。2004年,英国新的《猪福利法规》增加了给猪“玩具”的条文,以避免猪觉得生活枯燥,并规定对不遵守该法规的养殖户处以2500英镑的罚款。

保障动物福利的承诺

现在,中国动物们的福利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关注视线。

在中国工作的皮特原先供职于英国一家报纸,来中国后总被好客的中国人请到家里去吃饭,他很苦恼,他爱吃鱼,但每次朋友告诉他这是活鱼宰杀的时候,他都不敢吃。他说,在英国,宰杀活鱼是犯法的,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为重要的是,他敬畏生命。

不过,中国人的动物观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从2005年3月19日起,上海野生动物园的老虎、狮子们已经吃不到活鸡、活兔,因为鸡兔有了自己的“福利”。

3月中旬在昆明结束的“全国野生动物园保障动物福利专题会议”上,包括25家野生动物园联名签署《全国野生动物园保障动物福利承诺书》,承诺不当众向猛兽投喂大型活体家畜以招徕游客,并进一步改善动物们的福利。

经常带儿子去野生动物园的年轻妈妈张芸是一名教师,她说,给猛兽扔活物这个项目